

# 再谈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

——从“系统—生活世界”二阶社会构想出发

王凤才

**摘要** 为了对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病理学诊断，哈贝马斯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探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危机？如存在，其表现形式是什么？这关涉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问题；二是探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根源何在？这关涉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撇开第一个问题不谈，就第二个问题而言，“系统—生活世界”二阶社会构想，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的基本框架；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和控制，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的关键；基于交往合理性重建生活世界合理化，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的目标。因而可以说，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为考察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个较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根源，但也具有片面性与某种无能为力性；而且，基于交往合理性重建生活世界合理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甚至还有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辩护之嫌疑。

**关键词** 哈贝马斯 “系统—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殖民化 系统合理化 生活世界合理化

作者王凤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暨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4)08-0005-9

DOI:10.19862/j.cnki.syk.000924

为了对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病理学诊断，哈贝马斯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探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危机，若存在，其表现形式是什么？这关涉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问题。二是要了解“系统—生活世界”二阶社会构想，这是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的基本框架；二是要揭露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和控制，这是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的关键；三是要基于交往合理性重建生活世界合理化，这是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的目标；最后对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进行总体评价。

## 一、“系统—生活世界”二阶社会构想

“系统—生活世界”二阶社会构想，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的基本框架。就像安德鲁·埃德加所说，正是在“系统—生活世界”关系的讨论中，哈贝马斯阐发了生活世界殖民化观念。

哈贝马斯断定，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根源并不在于现代化或合理性本身，而是在于现代化的破碎化、合理性的片面化。在这里，哈贝马斯接受了 M. 韦伯关于社会现代化就是社会合理化的观点，但不同点在于，哈贝马斯将社会合理化分为系统合理化与生活世界合理化两个层面，前者是指工具行为合理化，关涉工具合理性；后者是指交往行为合理化，关涉交往合理性。若这两个层面协调发展，社会就不会出现危机；若这两个层面畸形发展，社会就会出现危机。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国家强化干预和科技意识形态化，从而

导致了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和控制，即生活世界殖民化，这才是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根源之所在。为了消除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就必须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为了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就必须弄清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真正原因。这就关涉“系统—生活世界”二阶社会构想。若要弄清“系统—生活世界”（System-Lebenswelt）二阶社会构想，就要了解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关系问题。为此，一是要了解社会系统结构性要素及其普遍性特征；二是要考察“系统整合—社会整合”如何过渡到“系统—生活世界”二阶社会构想。我们先考察社会系统结构性要素及其普遍性特征。

作为一个社会学范畴，“系统”概念有两层含义：从分析方法角度看，系统是一种观察和理解社会的方法，即系统分析法，借此可以分析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从实质内容角度看，系统是一种影响人类生活的社会组织原则或社会制度。但在哈贝马斯那里，“系统主要是一种作为强制性力量的社会”<sup>①</sup>，作为系统的社会，是由文化、政治、经济三大要素构成的，即社会系统可以划分为文化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它具备三个普遍性特征。

一是生产与社会化——社会系统的两个维度。在生产与社会化中，通过话语的有效性要求，社会系统与环境之间进行交换。在这里，哈贝马斯将社会系统的环境分为三个部分，即外部自然或非人类环境中的物质资源，与其他社会系统处于联系中的真正的社会，内部自然或社会成员的有机基础。“外部自然与内部自然的交换过程，对文化生活再生产的特殊形式来说是决定性的。”<sup>②</sup> 社会系统借助生产力使外部自然社会化，借助规范结构使内部自然社会化。或者说，面对外部自然，社会系统能够通过（遵循技术规则的）工具行为来获得自身；面对内部自然，社会系统通过（遵循有效规范的）交往行为来获得自身。但无论是对工具行为来说，还是对交往行为来说，以语言为媒介的主体间性结构都具有构成性意义。当然，对社会系统来说，内部自然并不像外部自然那样仅仅属于系统环境。因而，“我们不能将社会化（内部自然的社会化）与生产（外部自然的社会化）同等看待，都充分地理解为对环境复杂性的还原”<sup>③</sup>。因为内部自然既是系统环境，又是系统要素。

二是社会系统的理想价值改变受到世界观发展逻辑的限制。在生产水平与系统自主性程度相互依赖中，社会系统改变了其理想价值。世界观发展逻辑限制了社会系统的理想价值的改变，但系统整合命令对这种发展逻辑毫无影响。哈贝马斯指出，随着社会系统自主性扩大与复杂性提高，已经变成桎梏的规范结构自然会被打破，失去调控视角的参与限制自然会被淘汰。与此同时，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扩容的世俗知识与传统世界观之间在认知方面发生冲突，这样规范结构也就被打破了。当然，在社会进化的三个维度中，社会系统自主性的扩大，取决于另外两个维度发展，即生产力水平提高与规范结构变化。

三是社会系统发展水平取决于制度容许的学习能力。社会系统发展水平取决于理论—技术问题与实践问题能否区分开来、话语学习过程能否出现，即取决于制度容许的学习能力。哈贝马斯猜测，社会进化的基本机制在于“不能不学习”这种自动机制——在文化发展阶段上，需要解释的现象不是“学习”，而是“不学习”。可以说，人的理性就在于此。在区分了学习的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非反思性学习与反思性学习之后，哈贝马斯说，“一个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学习水平，可能依赖于社会组织原则是否容许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分化，以及是否容许（前科学的）非反思性学习向反思性学习过渡”<sup>④</sup>。

关于“系统整合—社会整合”如何过渡到“系统—生活世界”二阶社会构想，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问题》中，哈贝马斯就对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做了原则区分——“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关涉自我调控系统的特殊调控能力。在这里，“货币”（Geld）或“权力”（Macht）作为非符号媒介能够促使经济系统或政治系统平稳运行；只要货币或权力能够未受质疑地正常运转，那就不需要交往合理性行为，只有目的合理性行为足矣。“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关涉在制度系统中具有语言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被社会化的过程，在这里，社会系统表现为一个具有符号结构的生活世界。<sup>⑤</sup>

① 安德鲁·埃德加：《哈贝马斯：关键概念》，杨礼银、朱松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

②③④⑤ Jürgen Habermas, *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ätkapitalismus*, Frankfurt/M.: Suhrkamp, 1973, S. 19–20, S. 26, S. 28, S. 14.

到《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再次强调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区分——前者确定行为取向，后者通过行为取向而实现；但将两者统称为“社会的整合”（Integration der Gesellschaft）。哈贝马斯说，若将“社会的整合”仅仅理解为社会整合，那就是选择了从交往行为出发，将社会构思为生活世界的概念策略。这样，社会再生产就表现为生活世界符号结构的获得。若将“社会的整合”仅仅理解为系统整合，那就是选择了根据自我调控的系统模型构思社会的概念策略。然而，“对于一个社会理论来说，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将‘系统’与‘生活世界’的概念策略令人满意地联结起来——系统演化是根据社会调控能力的提高来衡量的；而文化、社会、个性的相互交织也表明生活世界符号结构的发展状况”<sup>①</sup>。因此，对社会的理解，既不能局限于系统整合，也不能局限于社会整合，而是要协调好两者的关系问题。

正是通过“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关系问题的讨论，哈贝马斯才引出了“系统—生活世界”二阶社会构想——系统整合关涉“系统”（System），主题是社会调控机制；社会整合关涉“生活世界”（Lebenswelt），主题是社会规范结构。哈贝马斯一再强调，“系统与生活世界”两者都有存在的权利，问题在于如何描述它们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将社会理解为生活世界，那就遮蔽了调控方面；如果我们将社会理解为系统，那就不会考虑到这种情况，即尽管社会现实性事实上被承认，但常常存在着反事实的有效性要求。”<sup>②</sup>因此，既要考虑作为系统的社会，又要考虑作为生活世界的社会。若想社会正常运转，那就必须协调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若系统与生活世界出现了不协调，那么社会就会出现危机甚至发生危机。

哈贝马斯指出，尽管社会形态并非仅仅按系统复杂性程度加以区分，但归根到底是由系统复杂性决定的。当然，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其运行方式并不仅仅遵循社会系统自主性扩大逻辑；毋宁说，社会进化在生活世界逻辑的界限内运行，生活世界结构通过以语言为媒介的主体间性规定，并建立在可批判的有效性要求基础之上。“在一个社会中，究竟哪个系统具有功能优先性，即能够引导社会进化，主要是通过社会组织原则确立的。”<sup>③</sup>

总之，在哈贝马斯那里，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根源在于生活世界殖民化；而生活世界殖民化则源于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不协调——社会形态归根到底是由系统复杂性决定的，而社会进化则是按照生活世界逻辑运行的。因而可以说，“系统—生活世界”二阶社会构想是哈贝马斯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的基本框架。

## 二、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和控制

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和控制，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的关键。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工具合理性膨胀，价值合理性萎缩，从而导致了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系统合理化与生活世界合理化失调，即由于系统合理化增长，系统侵蚀和控制了生活世界，从而导致了生活世界殖民化。所谓“生活世界殖民化”（Kolonialisierung der Lebenswelt），就是作为经济系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作为政治系统的官僚政治体制，借助“货币”（Geld）和“权力”（Macht）这两个非语言的媒介，侵蚀原本非市场化和非商品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从而侵蚀和控制了生活世界，导致意义丧失和价值丧失，最终导致了社会危机。

那么，系统是如何侵蚀和控制生活世界从而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呢？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首先考察了卢曼的系统理论观点——“系统—生活世界”脱钩过程，就是系统合理化与生活世界合理化的分化过程，即当系统复杂性提高、生活世界合理化增长时，“系统—生活世界”首先相互区分进而相互脱钩，以致生活世界逐渐下降为与其他亚系统并列的亚系统。哈贝马斯说：“系统理论外部观察已经给出的东西，似乎从内部视角得到了证实：社会系统越是复杂，生活世界就越是区域化。在一个分化开来的社会系统中，生活世界萎缩为一个亚系统。”<sup>④</sup>这样，作为目的合理性的经济行为和行政管理行为的系统机制，就相对独立于它们的道德—实践基础，并进一步控制了与价值规范相联系的交往行为。然而，生活世界仍然在整体上规定着系

①④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d. 2, Frankfurt/M.: Suhrkamp, 1995, S. 228, S. 232.

②③ Jürgen Habermas, *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ätkapitalismus*, Frankfurt/M.: Suhrkamp, 1973, S. 15, S. 30.

统。这样，依附于生活世界的系统就必须加以体制化。

这种体制化可以从系统分化方面看到，也可以从生活世界内部看到。例如，部落社会既可以被视为社会文化生活世界，也可以被视为自我调控系统。这表明，在部落社会中，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还密切相关。但到现代社会中，系统物化为非规范的社会结构，因而出现了权力媒介控制的社会关系领域，它不再容许形成从属于社会整合与符合规范的态度。

这样，“系统—生活世界”脱钩，就既可以被固化为系统视角，又可以被固化为生活世界视角，但就是不能将两个视角相互转换，“系统—生活世界”脱钩就不能被理解为两种秩序的分化过程。因此，我想分析系统复杂性提高与生活世界合理化之间的关联。<sup>①</sup>

哈贝马斯警告说，若将“系统—生活世界”脱钩理解为系统历史的形式方面，那么对文明史启蒙过程的嘲弄就会不断地暴露出来。因为生活世界合理化使系统复杂性提高成为可能，这种提高如此迅猛，以至于被释放出来的系统命令阻碍了被它们工具化了的生活世界的控制力。当然，不能由此认为生活世界结构依赖于系统复杂性而变化；相反，应该承认系统复杂性提高依赖于生活世界结构分化。因此，社会形态不能仅仅根据系统复杂性加以区分，毋宁说它们是由制度复杂性规定的。这种制度复杂性又使新出现的系统分化植根于生活世界中。

总之，“系统—生活世界”脱钩，不仅以成功为取向的行为（即工具行为）与以理解为取向的行为（即交往行为）分化为先决条件，而且以相应的行为协调机制分化为先决条件。哈贝马斯说，行为协调机制从语言媒介转变为“控制媒介”（Steuerungsmedien），意味着互动与生活世界语境脱钩。这样，总是嵌入生活世界语境中的理解过程，对媒介控制的互动来说就失去了价值，即生活世界对行为协调机制来说不再是必需的。因此，从生活世界视角看，行为协调机制从语言媒介转变为控制媒介，就不仅表现为解除交往费用与交往风险的负担，而且表现为生活世界技术化，即在扩大了连续的活动空间中的决断条件。“我们依据帕森斯的媒介理论清楚地说明了：只有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的行为领域才能被改置在控制媒介上。在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与个性社会化领域，这些控制媒介（货币和权力）就失去了作用。在这些领域，它们不能替代理解行为的协调机制。”<sup>②</sup>

事实上，生活世界殖民化是以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为基础的。

在这里，哈贝马斯不仅分析了生活世界殖民化与生活世界媒介化、工具化的关系问题，而且直接将生活世界殖民化与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勾连在一起，断定生活世界殖民化是以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为基础的。

哈贝马斯说，生活世界媒介化假定指向了在“系统—生活世界”相互区分又相互交织的地方形成的干扰现象。这样，生活世界媒介化就与生活世界结构一起完成了它们不再属于生活世界内部支配的过程。“使生活世界工具化、而不考虑生活世界自给自足假象的再生产强制，必须立即隐藏在交往行为的毛孔中。由此产生了一种结构性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强化可能的理解之主体间性形式。”<sup>③</sup>然而，“系统—生活世界”脱钩，意味着系统机制创造出了从生活世界中脱离出来的非规范的社会结构。最终，系统机制就排挤了那些在生活世界符号再生产活动的地方形成的社会整合形式。因而，生活世界媒介化就采取了殖民化形态。

在此，哈贝马斯进一步引申了 M. 韦伯的观点，即一种不能进行规范辩护的政治秩序，仅以主观信念力量的名义承载的“为政治权力而斗争”，最终仍然会导致合法性缺失。其实，M. 韦伯不仅想把私人领域的取向问题，而且想将政治合法性问题追溯到实体理性瓦解，追溯到意义丧失，但 M. 韦伯不明白：官僚化论题可以改写为生活世界殖民化。这种生活世界殖民化将道德—实践要素，从私人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中排挤出去。因此，“如果我们从马克思的视角占有 M. 韦伯关于时代诊断的观察，那么社会合理化悖谬就会采纳另一个版本”<sup>④</sup>。

哈贝马斯解释道，通过“系统—生活世界”二阶社会构想阐述的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理论，要求通过

①②③④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d. 2, Frankfurt/M.: Suhrkamp, 1995, S. 232, S. 476, S. 278, S. 485.

一种过时的阶级意识理论对现代社会进行补充分析。这种理论不应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而应解释日常意识在文化上的欠缺；不应驱逐革命意识的痕迹，而应研究文化合理化的条件。因此，“我这样解释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物化症候，即被媒介控制的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借助货币媒介和官僚政治媒介，侵入到生活世界的符号再生产当中”<sup>①</sup>。

其实，在货币和权力通过法律形式组织起来之前，生活世界合理化必须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这两个已经超越了阶级社会政治等级秩序的系统，摧毁了它们由以出发的欧洲传统生活方式。然而，这两个在功能上互动的系统，又反作用于那些使它们自身成为可能的、合理化了的现代社会生活方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货币化和官僚化已经渗透到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与个性社会化当中，即渗透到生活世界结构的核心领域。哈贝马斯断定，由货币和权力媒介形成的互动对生活世界的侵蚀，不可能在不导致病理学结果的情况下发生。

因为生活世界合理化一方面使得独立化的亚系统分化成为可能，同时也开启了市民社会的乌托邦视角。就是说，生活世界合理化以悖谬的方式同时释放了两者，即被系统归纳的物化与乌托邦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资本主义现代化总是植根于这个缺陷，即它摆脱了传统生活方式，而没有拯救其交往实体；毁灭了这种传统生活方式，而没有使之转型，以至于认知—工具合理性、道德—实践合理性、审美—表现合理性还停留在分化的较高水平上，而没有处于合理化的日常生活与交往实践中。<sup>②</sup>

总之，社会合理化过程“首先源于生活世界合理化，由此而导致或促生了系统层面的合理化，但最后却出现了生活世界被系统殖民化的情形”<sup>③</sup>。

### 三、基于交往合理性重建生活世界合理化

基于交往合理性重建生活世界合理化，是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的目标。正如 M. 韦伯所说的那样，合理化问题并不在于系统取向，而在于生活世界一般结构。因而，哈贝马斯强调，社会合理化构想可以从交往行为这个抽象视角出发加以构思，它指向被设定为共同背景知识的生活世界。这样，社会合理化不仅是指目的合理性行为在社会生活领域里的扩展，而且是指交往合理性行为在生活世界中的扩展，即不仅包括系统合理化（经济系统合理化与行政管理系统合理化），而且包括（在交往行为维度中刻画的）生活世界合理化。

首先，必须严格区分生活世界合理化与系统合理化。

哈贝马斯指出，相比于系统合理化，M. 韦伯忽视了生活世界合理化；况且，M. 韦伯仅仅从目的合理性行为层面讨论系统合理化。实际上，只有从目的合理性行为与交往合理性行为两个角度出发，才能切实地分析社会合理化问题<sup>④</sup>；当然，同交往合理性行为相关联的生活世界合理化与同目的合理性行为相关联的经济系统和行政管理系统的合理化，是必须严格区分开来的。简言之，生活世界合理化与系统合理化必须严格区分开来。

然而，社会合理化的结果是充满矛盾的——例如，帕森斯对体制化的个体主义欢欣鼓舞，但盖伦认为它是威胁社会整合、夸大个体抉择能力的主观主义。当然，只有从交往行为这个抽象视角出发，才能看出社会合理化是充满矛盾的——一方是以货币和权力作为调控媒介的目的合理性行为系统的合理化；一方是与生活世界的主体间性结构相联系的日常生活或交往实践的合理化。“因此，竞争并不在于以理解为取向行为与以成功为取向的行为之间，而在于社会整合原则之间，即在于从生活世界合理化中产生出来的越来越纯粹的、以有效性要求为取向的语言交往机制与从以成功为取向的行为系统分化中产生出来的非语言的调控媒介（如货币和权力）之间。”<sup>⑤</sup> 这样，M. 韦伯所说的合理化悖谬就可以概括为：生活世界合理化使得系统整合成为可

①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d. 2, Frankfurt/M.: Suhrkamp, 1995, S. 522.

② Vgl.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d. 2, Frankfurt/M.: Suhrkamp, 1995, S. 486–487.

③ 参见阮新邦、林端：《解读〈沟通过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页。

④ 参见王凤才：《重新理解“社会合理化问题”——从哈贝马斯视域出发》，《学术月刊》2023年第10期。

⑤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d. 1, Frankfurt/M.: Suhrkamp, 1995, S. 459.

能,这种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处于竞争之中,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生活世界产生“解整合”(Deintegration)的影响。

若将生活世界合理化与系统合理化区分开来,就不会导致系统理论观念对行为理论观念的吞噬(如在帕森斯那里)。系统理论认定社会合理化源于系统复杂性提高,行为理论认定社会合理化源于生活世界结构性要素区分。但在哈贝马斯看来,行为理论与系统理论都是辩证的总体性概念的一个片段。因而,只有当米德感兴趣的生活世界合理化关联于功能主义分析时,它才在系统历史中获得地位价值;与此相反,涂尔干的劳动分工论具有这样的优势,即它将社会团结形式置于社会系统结构分化的关联之中。

其次,生活世界合理化关涉生活世界结构变化趋向。

M. 韦伯强调文化行为系统(科学和技术、文学和艺术、法律观念和道德观念)的进化论意义;米德、涂尔干强调民主政治意志形成的进化论意义。哈贝马斯从以下三个方面将米德和涂尔干的生活世界合理化概念加以系统化,这样,哈贝马斯对米德和涂尔干路径的阐释中获得的生活世界合理化概念,就关涉生活世界结构变化趋向,这种趋向借助文化、社会与个性之日益增长的分化表现出来。

(1)生活世界结构性要素区分,在不同关系中有不同意味——在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中,意味着制度系统与世界观的日益脱钩,或曰文化传统处于不断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更新状态;在个性与社会的关系中,意味着人际关系确立、连续性活动空间拓展,或曰社会合法秩序越来越依赖于规范论证;在文化与个性的关系中,意味着传统的更新越来越依赖于个体的批判能力与创新能力,或曰个性形成是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自我肯定建构起来的。这表明,生活世界结构性要素区分,并不是指文化、社会、个性这三种要素增多或减少,而是指三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清晰。(2)生活世界之形式与内容的分离,意味着人们不再关注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个性社会化这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而只关注其形式要素。这表明人们的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的抽象化。(3)符号再生产的反思形成,意味着生活世界的符号再生产过程反思性增强,即在不同文化领域、不同社会制度甚至在儿童教育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理性反思日益占据重要地位。

因此,生活世界合理化就是指生活世界结构性要素越是细致地区分,相互理解条件下互动的情况就会越多,这种理解建立在权威论证和意见一致的基础之上。这就意味着,在生活世界合理化状态下,在文化再生产方面,交往行为服务于文化知识传播、批判和流传;在社会整合方面,交往行为服务于主体间性承认有效性要求的行为调控;在个性社会化方面,交往行为服务于个性认同形成。而生活世界的符号结构则是通过有效知识连续性、共同体团结稳定性、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参与者社会化途径再生出来。这样,再生产过程就在符号内涵的语义学领域、社会空间(被社会整合了的群体)、历史时间(世代相继的各代人)各个维度上建立起生活世界新状况与现存状况之间的联系。

总之,生活世界合理化首先表现为生活世界结构变化,表现为知识体系分化对日常生活与交往实践的影响过程,它不仅包括文化再生产形式,还包括社会整合形式和个性社会化形式。“生活世界合理化不仅延伸到文化再生产与社会整合领域,而且延伸到社会化领域。”<sup>①</sup>

再次,必须在交往合理性概念基础上重建生活世界合理化。

随着生活世界合理化程度提高,也许会延迟可能出现的生活世界再生产紊乱;但生活世界进一步合理化,绝对不能保障人们能够摆脱紊乱的生活世界再生产过程。“如果我们将涂尔干追溯到‘解整合’的社会冲突一般地理解为在结构上分化开来的生活世界再生产的紊乱,那么‘有机团结’就可以描述为合理化的生活世界内部规范的社会整合形式。这些规范形式就像‘失范形式’(anormale Formen)一样,存在于生活世界的符号结构层面。”<sup>②</sup>

这意味着,在生活世界的符号结构中,既存在着规范的社会整合形式,也存在着失范形式。哈贝马斯说,像自由丧失、意义丧失、异化——这些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病态现象都可以追溯到生活世界本身的合理化。生活世界合理化,作为社会进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对普通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信念和技能进行批

①②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d. 2, Frankfurt/M.: Suhrkamp, 1995, S. 221, S. 222.

判性审查和论证的过程。<sup>①</sup>就是说，当作为生活世界组成部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信念（例如，关于技术、道德、政治、审美的价值观念，以及我个人的信念、癖好、自我认同感）遭到质疑时，生活世界合理化就出现了；尽管提出质疑的是个人，但生活世界合理化显现在文化层面上。简言之，“生活世界合理化可以理解为交往行为中固有的合理性潜能的连续释放”<sup>②</sup>。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中，哈贝马斯描述了生活世界合理化的出路：“对文化来说，一个不断修正的状态成为反思的传统；对社会来说，一个依赖于规范确定与规范论证形式的合法秩序状况，最终是话语程序；对个性来说，一个风险自我控制状态，就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自我认同。”<sup>③</sup>换言之，通过生活世界合理化形成了对由知识保障的批判性解决办法、普遍价值规定与规范论证以及自我控制的个性的结构性强制。

最终，哈贝马斯想在“交往合理性”（kommunikative Rationalität）基础上重建生活世界合理化，并认为这是克服生活世界殖民化、消除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唯一现实路径。<sup>④</sup>他说，随着世界观的“解中心化”（Dezentralisierung），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个性社会化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如果可以证明世界观的解中心化与生活世界合理化是一个解放的社会之必要条件，那么，程序主义的交往合理性概念就可以为这样一种批判奠基。只有将可能的生活形式之高度发达的交往之内部结构与成功的生活形式之历史表达混淆起来，才是乌托邦主义的”<sup>⑤</sup>。

### 结语：如何评价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

对哈贝马斯的当代社会理解来说，“系统—生活世界”二阶社会构想至关重要。

关于“系统—生活世界”问题，哈贝马斯在许多著作中都已经关涉。例如，在《技术进步与社会生活世界》（1964）一文中，哈贝马斯想用政治意志形成的参考系来重新表述技术进步与社会生活世界的关系问题。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中，哈贝马斯指出社会系统发展似乎是由科技进步规定的。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问题》（1973）中，哈贝马斯强调，复杂社会的统一性是通过从调控方面处理的系统整合不依赖于关涉生活世界方面的社会整合而确立的。不过，在上述文本中，“系统—生活世界”问题并没有展开论述，直到《交往行为理论》（1981）中，“系统—生活世界”问题才得到了较为全面的阐发。在那里，哈贝马斯承续《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问题》第1章的话题，进一步讨论了与“系统—生活世界”问题密切相关的“系统整合—社会整合”问题；讨论了生活世界殖民化与生活世界媒介化、工具化的关系问题，以及生活世界殖民化与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的关系问题；分析了系统合理化与生活世界合理化的关系问题，并试图在交往合理性基础上重建生活世界合理化。所有这些，都是哈贝马斯分析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的关注点。

这样，“系统—生活世界”二阶社会构想，就成为哈贝马斯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的基本框架。在这个基本框架中，哈贝马斯将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根源归咎于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不协调、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和控制而导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尽管“这个根源”未必是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之真正原因，但至少可以说是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之部分原因。因此，对哈贝马斯的当代社会理解来说，“系统—生活世界”二阶社会构想至关重要，它为考察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也具有片面性与某种无能为力性。

生活世界殖民化是“社会的复杂性增加所带来的令人不快的后果之一，以及那些社会的组织化和稳定化所呈现出来的问题”<sup>⑥</sup>。与生活世界殖民化交织在一起的生活世界合理化，是一个社会进化过程，借助这个过程，一个社会通过对现有信念和能力的反思来增强它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社会与社会成员都扩展了其自

①⑥ 安德鲁·埃德加：《哈贝马斯：关键概念》，第147、17页。

②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d. 2, Frankfurt/M.: Suhrkamp, 1995, S. 232.

③ Jürgen Habermas, *Der philosophische Diskurs der Moderne*, Frankfurt/M.: Suhrkamp, 1985, S. 399.

④ 参见王凤才：《再谈“合理性问题”——从哈贝马斯视角出发》，《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⑤ Vgl.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d. 1, Frankfurt/M.: Suhrkamp, 1995, S. 109.

由和自主行动的范围。可见，在哈贝马斯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中，“生活世界合理化”之较为乐观的描述与“生活世界殖民化”之更为悲观的描述交织在一起。<sup>①</sup> 其实，即使“生活世界合理化”描述也不见得就是乐观的。因为生活世界合理化与系统合理化交织在一起——随着系统不断复杂化，系统合理化与生活世界合理化出现失调，即系统侵蚀和控制了生活世界，从而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进而导致社会危机。

因而可以说，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根源，但也存在着片面性和某种无能为力性。<sup>②</sup> 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本人也是承认的。例如，在《交往行为理论》“第 3 版前言”中，哈贝马斯坦承 J. 贝格尔 (J. Berger) 的反对意见很有道理，促使自己认识到了生活世界殖民化主题的片面性，因而仅仅用系统侵蚀和控制生活世界对社会问题进行诊断是行不通的。然而，哈贝马斯还是没有看到或不承认，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而不在于生活世界殖民化。

尽管哈贝马斯试图在交往合理性概念基础上重建生活世界合理化，但这种努力并没有成功。就像维尔默所说，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合理化概念，并不表征非强制的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结构，而是表征生活世界的结构性强制。因而，它不表征社会理想状态，而是表征并不合理的社会背后的困境。然而，若生活世界合理化不表征社会理想状态，而只包含着结构变化的描述，那就非常清楚：为了把握某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仅有生活世界合理化概念是不够的。因为它不能仅仅被理解为生活世界的合理化过程，而且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起作用的社会意识并没有可能的有效的保障基础，也没有只能用实际的交往和论证手段保障共同性的网络。“这个过程就是最终审判机关，因为‘语言理解的否定性潜能’的开发，只能被理解为学习和创新过程；但其关涉点并不是一个未来可以思考的非强制的理想的交往共同体，而是当代的经验病理学、非合理性、缺陷、非人道性。”<sup>③</sup>

此外，生活世界殖民化理论有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辩护之嫌疑。

哈贝马斯之所以讨论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与他对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学诊断有关。在哈贝马斯那里，所谓“后期资本主义社会” (Spätkapitalismus)，就是指“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国家调控的资本主义”，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

如前所述，为了对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病理学诊断，哈贝马斯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探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危机，其表现形式是什么，这关涉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问题。二是探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根源何在，这关涉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哈贝马斯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如果撇开作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增长后果的全球性危险不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四种危机趋向<sup>④</sup>，即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性危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可称为合法性危机论——它从不同视角描述了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揭示了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特征、新趋势，这有助于我们对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理解和深刻批判。不过，哈贝马斯有用政治—文化危机淡化经济危机的倾向，这不仅像早期批判理论家一样，片面夸大了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有陷入文化精英主义的危险；而且离开了早期批判理论家的激进批判立场，有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辩护之嫌疑。

对第二个问题，哈贝马斯与早期批判理论家不同——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考察文明发展，认为文明危机根源在于启蒙理性膨胀，即启蒙理性的原罪在于它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破裂，而这又是由于工具理性霸权造成的。因此，他们觉得有必要“更加深入地确立物化批判的基础，并从整体上将工具理性拓展为世界历史文明过程的范畴，也就是将资本主义现代性开端背后的物化过程，延伸到人类形成

① 安德鲁·埃德加：《哈贝马斯：关键概念》，第 150 页。

② Vgl.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d. 1, Frankfurt/M.: Suhrkamp, 1995, S. 3-4.

③ Albrecht Wellmer, *Ethik und Dialog*, Frankfurt/M.: Suhrkamp, 1986, S. 162.

④ Jürgen Habermas, *Legitimationsprobleme im Spätkapitalismus*, Frankfurt/M.: Suhrkamp, 1973, S. 66.

的开端中”<sup>①</sup>。

哈贝马斯指出，尽管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试图借助批判理性遏制工具理性膨胀，但仍然是在意识哲学框架内对现代社会进行悲观主义的浪漫主义文化批判，并未揭示社会危机的真正原因，更没有找到拯救现代社会的途径。这样，面对现代社会的困境，他们除了愤世嫉俗的批判，只能是悲观绝望。与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不同，哈贝马斯不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破裂角度寻找社会危机根源，而是将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根源归咎于生活世界殖民化，这就坚持了早期批判理论家对现代社会的批判立场；但哈贝马斯试图在对现代社会的校正中重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显示出他对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辩护和认同倾向。譬如，在“68运动”中，哈贝马斯从开始时同情和支持学生到后来谴责学生是“左派法西斯”——因为学生运动的激进化、“革命化”。哈贝马斯认为，尽管当时联邦德国政治生活存在着不民主、不自由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整个社会制度还是比较优越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也是比较稳定的。<sup>②</sup>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辩证法的新阐释”（22JJD710004）、复旦大学哲学一流培优行动计划“中国当代哲学话语自主创新语境中《否定辩证法》的新阐释”（IDH3155074/01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盛丹艳）

## Rethinking Habermas' Theory of Lifeworld's Colonization

—— From the Second-order Social Construct of “System-lifeworld”

WANG Fengcai

**Abstract:** To make a pathological diagnosis of late capitalism, Habermas mainly starts from two aspects. Firstly, to explore whether there is a crisis in late capitalism and what is its manifestation, which concerns the problem of the legitimacy of late capitalism. Secondly, to explore the root of the crisis of late capitalism, which concerns the problem of lifeworld's colonization. Here, leaving aside the first question, as far as the second question is concerned, the second-order social construct of “system-lifeworld” is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theory of lifeworld's colonization; the erosion and control of the lifeworld by the system is the key to the theory of lifeworld's colonization; rebuilding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lifeworld based on communicative reason is the goal of the lifeworld's colonization theory. Habermas's theory of lifeworld's colonization provides a more explanatory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examining late capitalism; to a certain extent, it reveals the root of the crisis of late capitalism, but it is also one-sided and powerless. Habermas's efforts to reconstruct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lifeworld which is based on communicative reason have not been successful, and it may even be suspected of defending late capitalism.

**Key words:** Jürgen Habermas, system-lifeworld, colonization of lifeworld, rationalization of system, rationalization of lifeworld

① Jürgen Habermas,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Bd. 1, Frankfurt/M.: Suhrkamp, 1995, S. 489.

② Vgl. Interview mit Jürgen Habermas am 23. März 1979 in Sternberg, in: Detlef Hoster, *Habermas zu Einführung*, SOAK Verlag Hommer, 1980, S. 75.